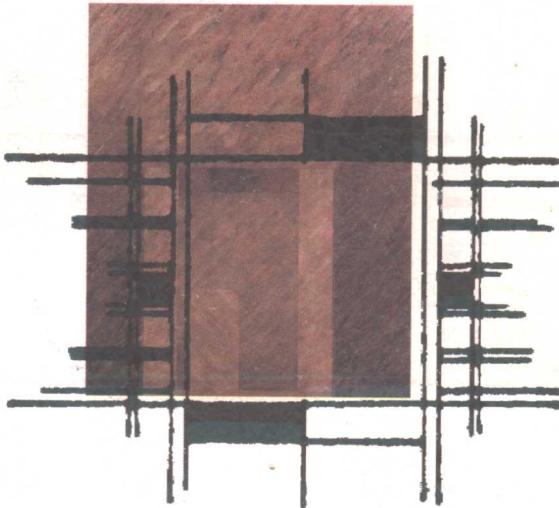




反思历史不宜迟

丁东著



KOUMENZHE WENCONG DING DONG ZHU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上海三联书店

ANSI LISHI
UYI CHI

反思历史不宜迟

丁东著



KOUMENZHE WENCONG DING DONG ZHU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上海三联书店

FANSI LISHI
BUYI CHI

反思历史不宜迟

著 者/丁 东

丛书策划/王 平 周爱华

责任编辑/张大伟

装帧设计/范娇青

责任制作/钱震华

责任校对/朱正运

出 版/上 海 三 艺 书 店

(20023) 中国上海市钦州南路 81 号

发 行/东 华 大 学 上 海 发 行 所

上 海 三 艺 书 店

印 刷/华东师范大学印刷厂

版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850 × 1168 1/32

字 数/230 千字

印 张/12

印 数/1—5000

ISBN7 - 5426 - 1292 - 1
I · 167 定价 20.00 元

目 录

书里书外

- 3 反思历史不宜迟
- 12 反思之书
- 17 呼唤黄钟大吕
- 19 好书无人识与好书出不来
- 22 乌纱帽二题
- 27 两本回忆录 两代报人魂
- 31 1996年读书记
- 41 于无声处聚惊雷
- 45 徐晓和口述实录
- 52 南国有强音
- 55 天平与抉择
- 59 瞧这一家子

目
录

- 61 刮目相看张竞生
63 “文革”作品怎么选
67 精神化石的意义
70 反思红卫兵
82 一则日记与一段痛史
85 周一良与陈旭麓
90 表达的代价
93 《洗澡》与洗澡
95 对照新凤霞
98 让她安息
100 秘史荟萃《百年潮》
103 绿色文化的自觉
106 多嘴多舌的知识分子
112 当今中国的思想走势
120 批评《苦恋》的往事
126 世情小说里的性文化
137 我观顾城
142 官员的智慧与学者的智慧
146 回到平常心
150 怀念王小波
155 王小波的人生选择
167 和王小波相处的日子
174 告别舆论一律
186 文学批评的萎缩和文化批评的兴旺

书前书后

- 193 《冬夜长考》后记
196 《野菊文丛》搭车记
199 《和友人对话》序
204 我和《老插话当年》
209 《竞争与谋略》丛书序
213 《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编后记
217 遇罗克是谁?
220 王申酉是谁?
223 《逝去的年代》序
228 《思想备忘录》跋
232 《越生文存》编后记
239 《反思郭沫若》编后记
243 《报馆旧踪》序
245 《书局旧踪》序
247 《世纪学人自述》序
253 《顾准日记》编后记
258 《顾准日记》出版的经过与意义
265 《顾准寻思录》编后记
268 顾准之谜我见
277 顾准生前友好访谈录

目
录

人间百态

- 305 首选国货
- 308 老一代人的消费心理障碍
- 311 再就业的心理磨擦
- 315 羡慕
- 318 培养弱者
- 322 借鸡下蛋害处多
- 325 信用从哪里走失
- 328 大旗不是护身符
- 331 文化不是包装纸
- 334 儒商难觅
- 337 扶贫与扶官
- 340 漫谈纳税人
- 345 的哥不敢想将来
- 347 祸与福
- 350 让孩子折腾
- 353 面对影视
- 357 内心的魔鬼
- 360 大山里的编外师生
- 364 寻找火把节
- 370 迷人的降扎
- 373 两个戏台
- 375 后记

书里书外

反思历史不宜迟•

反思历史不宜迟

今年以来，出版了一批反思中国 20 世纪历史，尤其是后半叶历史的力作。我印象较深的，有以下几种：

一、戴煌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中国文联出版公司、新华出版社）。戴煌先生是一位年逾古稀的资深记者，以仗义执言著称于世。几十年来，他手握如椽大笔，写过无数脍炙人口的好文章。其中最有分量的，就是这本书。由胡耀邦等领导人主持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是中国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的一件大事，不但使千千万万的冤魂得以昭雪，更使数以亿计的中国人恢复了做人的尊严。没有

此举，民族元气无法恢复，人间正气无法伸张。戴煌本人不但是平反冤假错案的采写者，也是冤假错案的直接受害者和平反冤假错案的身体力行者。他曾蒙冤达 20 年之久，九死一生，饱尝人间冤狱之害；直到今天，他仍然经常为解决基层百姓的冤案奔走呼吁。此书不但以材料扎实见长，而且思想锋芒锐利，笔锋饱注感情。虽 30 余万言，却一气呵成，让人拿起来再也放不下。难怪胡绩伟先生读后赞曰：读君一卷书，胜学十年史！

二、朱正的《1957 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河南人民出版社）。朱正先生今年 67 岁。这本书，写作的时间虽然只是一年，但准备的时间却很长很长。从他 1957 年被打成右派算起，可以说酝酿了 36 年，如果追溯到他在 1955 年肃反中挨整，他已经将苦果咀嚼了近四十年。从青年，到暮年，一本书凝结了他一生的苦难与思考。全书共 45 万字，然而作者只是在附录中有千余字谈到个人遭遇，其余都不涉及自己。他把不幸的遭遇，化作深入反思的心理动力，沉淀为史家冷峻的理性，从而孕育了这本沉甸甸的大作。

1957 年的反右运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至今仍然是学术研究的薄弱环节。写反右的书，朱正不是第一本，却是迄今为止水平较高的一本。外国人也写，比如美国汉学专家麦克法夸尔的《“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一部，实际上就是研究反右的专著，但他和中国毕竟隔着一层。中国人写的也有几部，其中华民和丁抒的两本比较好，但还是不如朱正这本有影响。其他几部就更不必

说了。

我读了本书的印象是，反右斗争的恶果，不仅仅是一次阳谋使多少敢言之士被“引蛇出洞”，也不仅仅是几十万知识分子蒙受 20 年不白之冤，而且是中国一批先觉者改革努力的流产，是中国 50 年代中期一次思想解放的夭折。被打成右派的知识分子，固然不少人确实冤枉，罪名本是“莫须有”，硬被推进火坑凑数；不少人是宗派斗争的牺牲品；一些人本来很革命，“左派”被当作右派误伤；但有一批右派，则是看出这个体制的弊病，提出了改革的真知灼见。这些涉及民主法治、社会经济、科学教育、文化艺术、新闻出版、思想学术等诸多领域的真知灼见，现在回过头来看，正是中国 1978 年以来改革的先声。朱先生是考证鲁迅出身，治学一向严谨。为了写这一本书，光是参考资料就编了五本书（可惜没有出版）。他的每一个论点，都有大量原始材料作依据，而且对有疑点的材料作了认真的辨析。此书不仅使反右运动的研究进入新的境界，而且打开了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新视野，并为在目前语境下民间修史，高标起独立研究的风范。

三、韦君宜的《思痛录》（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韦君宜老人已到了耄耋之年，几年来一直在病榻上苦撑，只有一息尚存。《思痛录》是老人晚年半身不遂后的封笔之作。她不是一般地追忆生平，而专门述说自己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从延安抢救失足者、三反五反、胡风案、反右派、“大跃进”、反右倾，一直说到“文革”，千种折腾，万般荒谬，集于一

书。她原来是为着崇高的理想投身革命，却痛感无法在革命的秩序中保持做人的起码操守，把以革命面貌出现的专制主义对知识分子人格的扭曲解剖得淋漓尽致。这些年，老作家、老学者的回忆文字日见其多，但达到韦著这种深度的却不多。我想原因有二：一是许多老作家、老学者虽然饱尝艰辛，但对那个体制黑箱的内幕缺少直接体验，难以鞭辟入里，而韦君宜长期担任领导职务，经历了许多事件的决策过程，所以她的笔触能够入乎其内；二是和她同样担任过领导职务能够入乎其内的，又不像她这样大彻大悟，能够出乎其外地痛彻反思；或内心虽有深刻反思，却不能这样直言不讳地诉诸文字，坦诚地面对历史，坦诚地解剖自我。所以，这本书虽然不过 12 万字薄薄一册，其思想深度和精神穿透力，足以与巴老享誉一时的《随想录》并论，甚至在某些方面已经超越。

四、葛剑雄的《悠悠长水》和顾潮的《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如果说，前面几种书是过来人讲自己的经历，那么这本书则是中年人写老一辈。葛著是为其师谭其骧先生作传，顾著是为其父顾颉刚先生作传。建国以后的 30 年，运动频繁，教训颇多。20 年来，对那些危害大、伤人多的运动作了一些清理和反思。相比之下，对 1951 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涉及不多。也许，从后果上讲，这次运动还不像后来那些运动，采取疾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方式，造成了大批的冤狱；从范围上讲，主要在学校等知识分子相对集中的领域，而没

有覆盖全社会。然而,从精神实质上看,这个运动也可算是其他运动的一曲前奏。这两本传记,不是专门写这一段历史的,葛著谈到这一段历史的章节约三万字,耐人寻味的是直接引用的大量原始记录,不但有谭其骧教授当时的检查交待,还有同在复旦大学的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等教授的检查交待,还有他们当时受到的批判,以及互相之间的批判。顾著很少涉及传主以外的人,但依据传主日记等第一手材料,再现了顾颉刚在思想改造期间的心理活动。有关章节虽不足万字,读后亦给人以身临其境之感。

顾颉刚、谭其骧,都属于书斋型知识分子,既不热衷于政治,更不谙熟于政治。他们所执着的就是自己的专业,并取得了国内外公认的成就。当时,中国的各种专业技术人员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过百分之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是一个很低的比例。像顾颉刚、谭其骧这样的饱学之士,更属凤毛麟角。一个国家,要想兴旺发达,让这样的学者专家专心教书治学,发挥所长,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现在提倡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科教兴国,也是这个意思。然而,在50年代初,这些知识分子对政治想躲也躲不开,思想改造就是他们尝到的第一记精神杀威棒。当时的思想改造,是和三反运动连在一起的。这些教授有什么贪污浪费行为呢?查来查去,无非是领了稿费,没有缴工会会费,丢过图书馆的书,私用了印考试卷的纸之类的鸡毛蒜皮问题。后来领导者也看到从这些教授中抓不出什么经济大老虎,于是转向抓思想老虎,让这些教授交待家庭出身,社会关系,

检查资产阶级思想。

当时，教授们的尴尬心态可想而知。顾颉刚在上海几所大学兼过课，只好说这是“贪污”。难道顾颉刚还分不清什么是贪污么？无奈“三反之时，不贪污不如贪污。思想改造时，则不反动不如反动，以贪污反动者得有言可讲，有事可举，而不贪污、不反动者人且以为不真诚也。好人难做，不意新民主主义时代亦然，可叹矣！”（顾颉刚日记）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分裂，恐怕从这时就开始了。有人受不了这些，比如治文学批评史的刘大杰教授，就跳过黄浦江，幸好自杀未遂。

当然，一次运动，未必能让知识分子彻底服贴。顾颉刚政治上接受了改造，学术还在坚持，为自己的疑古思想和考据学的反封建性作过辩解。用他自己的话说，“一手画圆，一手画方，必然两难画好。”这种思想改造，解放初由执政党直接出面，后来交由民主党派作自我改造。顾著记载，1958年，“自参加民进整风后，无日不开会，既须检讨自己，又须批评别人，又须写大字报，无寸晷之暇，父亲精神紧张，失眠之疾又发，且腰痛大作，‘然社会主义关又不能不过，则只有拼命做去耳’；由于当时整风小组同人徐伯昕、许广平、杨东蓴、赵朴初、徐楚波、谢冰心、严景耀等人均是这般真诚的态度，因而父亲也‘只有勉强挣扎，只要不致跌倒，总当竭蹶以赴’。”一些高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执政党只是破了题，最后却是由民主党派内部完成的。

葛剑雄这样评论思想改造的直接后果：“当学校的每一

位教师都得自愿或不自愿地在群众——包括他们的学生——面前将祖宗三代的‘反动’背景、本人贪污‘罪行’和资产阶级思想彻底交待，并作出深刻反省之后，怎么能指望这些 20 岁上下的青年人对他们保持足够的尊敬和尊重呢？陈旭麓对知识分子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概括：“什么叫知识分子？应该说他们是站起来思考着的人”。（《浮想偶存》）而思想改造，实际上是让知识分子从精神上自我污辱，自我阉割，匍匐在地，长跪不起。中国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的烽火硝烟中，不乏可歌可泣的壮举；在反对内战，反对蒋介石独裁，争取和平民主的斗争中，也不乏可圈可点的佳话。到了 50 年代，自信和自尊的精神堤坝却从此决口，一溃千里，日后再想重建，竟是难上加难了。葛著讲到谭其骧晚年，“为又一次运动的结束写了一份小结。我见他写得很快，不像其他文章那样要拖上好多天，不禁感到惊奇，他长叹一声道：‘咳，解放以来这样的东西不知写过多少了！无非是骂自己吧！’”一个细节，可见那一代知识分子心理创伤之深。就算是一棵草，在石头缝里扭曲着生长，要想重新抻直都很难，何况是有血有肉的人呢？

清华大学何兆武教授最近为《世纪学人自述》撰写的专稿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善意固然是人性，恶意也是人性，——例如除了人这个动物而外还有哪种动物是以虐待自己的同类为乐的？‘文革’对于其他专业工作者未免是一种损失，使他们失去了大量宝贵的钻研时间，但是唯独对于文科来说，它却是一次无比的收获，它使得我们有个千载难

逢的机会去体验到人性的深处，这是任何太平盛世所梦想不到、求之不得的机会。几千年全部的中国历史和在历史中所形成的人性，都以最浓缩的形式在最短的时间之内迸发出来。如果今天的历史学家不能运用这样空前（或许也绝后）的优异条件写出一部或若干部“文革”史、中国史乃至世界史、历史学理论、方法论和历史哲学的书来，那就未免太辜负自己所经历的时代了。”我很赞成何教授的观点。然而，这些年，严肃地反思历史，包括对反右、“文革”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进行深入的探讨，遇到了许多人为的阻力。面对阻力，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应当知难而退。一个健忘的民族决不是健康的民族。作家和出版家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抵抗历史的健忘症。

前些天，我去看望 85 岁的冯亦代先生。冯夫人黄宗英说，他是今年元旦得了一次病，幸亏抢救及时，没出危险，目前正在努力恢复。每天坚持锻炼，与体能衰退抗争，练得很苦。我不禁想起前年和妻子去采访他，请他对生平经历作一次回顾。别的事他都愿意说，唯独不愿意说反右那一段。他当时的托辞是，再说那些事没什么意思。我心里清楚，人活一辈，能有几个 20 年？那种遭遇怎么能无动于衷呢？冯老不愿意说，无非是几种可能：第一个可能是不愿意再触痛那块伤痕；第二个可能是不想涉及当事人；第三个可能是上面对这一段的说法还留着尾巴，心理上还有顾虑。后来，妻子的文章只好对他当右派的经历一带而过。这一次，冯老却吃力地告诉我，最大的心事，就是还有一篇文章没写出